



大学经典

周天游 导读
戴扬本 整理

汉书 详节

〔汉〕班固 原著

〔宋〕吕祖谦 编纂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grid of colored squares. The top row has five squares: light blue, dark blue, light blue, dark blue, and light blue. The bottom row has five squares: light blue, dark blue, light blue, dark blue, and light blue. The squares are arranged in a 2x5 grid.

1

100

汉书·汉节

[汉] 班固 原著

[宋] 吕祖谦 编纂

周天游 导读 戴扬本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详节/(汉)班固原著,(宋)吕祖谦编纂;周天游导读;戴扬本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4671-8

I. 汉… II. ①班…②吕…③周…④戴 III. 中国-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传体 IV. 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668 号

责任编辑 占旭东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汉书详节

[汉]班固 原著 [宋]吕祖谦 编纂 周天游 导读 戴扬本 整理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mm 1/16
印 张 42.75
插 页 4
字 数 750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4671-8/K·976
定 价 66.00 元

汉书详节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

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汉 书 详 节

导 读

周天游

《汉书》一百篇，今本析为一百二十卷，汉班固(32—92)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

班固字孟坚，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班固是楚人的后裔。秦灭楚，班氏被强行迁徙到山西、河北的北部一带。汉初，班壹“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汉书·叙传》)，俨然是一方大豪。传至班况，举孝廉为郎，迁越骑校尉，跻身显贵行列。成帝时，况女被封为婕妤，班氏摇身一变，成为外戚。况子班斿，有俊才，成帝“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汉书·叙传》)。要知道当时贵为皇叔的东平思王向成帝求赠《史记》及诸子书都不可得，足见班氏所受恩宠之盛。这批赐书一方面为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汉书·叙传》)，使班彪父子在与他们的学术交往中，获益匪浅。

两汉之际，班彪避乱于陇上，因不满刘向、扬雄等人对《史记》的补作，于是潜心写作《史记后传》，成六十五篇。今本《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明确可知出于班彪之手。东汉建武三十年(54)，班彪病逝。从此班固继承父亲遗志，凡武帝以前汉史以

《史记》为蓝本，武帝以后汉史以《后传》为基础，复博采旧闻，整齐故事，上起汉高祖斩蛇起义，下迄王莽新朝覆亡，断代为史，而作《汉书》。白居易曾说：“谈之书，迁能修之；彪之书，固能终之。”这不失为史林一段佳话。

汉明帝时，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因而班固被打入狱中，书稿也遭封存。所幸汉明帝是个颇有头脑的明君，他敏锐地发现著史对巩固刘氏统治极为有利。于是他赦免了班固，命他任兰台令史，先作《光武帝纪》、云台二十八功臣传以及刘玄、刘盆子、公孙述、隗嚣诸所谓割据势力的载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当代正史——《东观汉记》的问世，揭开序幕。之后，又命班固安心写作《汉书》。

班彪淡泊名利，一心著述。班固却喜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章帝在位，他曲意奉迎大将军窦宪，深得器重，家人及奴仆便仗势欺人，连洛阳令种竞也难逃受辱，又不敢声张。然而窦宪一垮台，种竞乘机将班固关入狱中，不久死去。

班固死后，《汉书》中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完稿。和帝命其妹班昭续修，又令马续协助班昭完成《天文志》。于是《汉书》历经四人之手，著述近四十年，才算大功告成。

《汉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书》断代为史，适应了历代统治者的“以史为鉴”的政治需要，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其余正史均采用《汉书》史体。刘知幾《史通·六家篇》曰：“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确非虚誉。

其次，班固因袭《史记》体裁，又有所创新。他根据西汉从整体而言，已无春秋战国时的独立封国，所以弃用“世家”，并入“列传”。又改“书”为“志”，虽实质未变，内容却有较大补充。如《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

为首创，充分体现他博学洽闻的特点。从《汉书》八表来看，《古今人表》无汉臣，确有暗讽当代之意。而《百官公卿表》是第一次将承继秦制的汉代官制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成为后人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此外，在列传的编次上，以时代为序，先专传，后类传，再边疆传，均以姓或姓名或专名命篇，虽失去《史记》命篇以寓褒贬之深意，格式上略显呆板，但在形式上的确起到整齐体例，便于翻检的效果，成为以后正史编目的规范。

再次，班固在纠谬补缺上作了大量工作。如补立《惠帝纪》，增加《王陵传》、《吴芮传》、《蒯通传》、《伍被传》、《贾山传》等；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颇有史料价值。他在纪传中增入帝王诏令及朝臣奏疏，如贾谊《治安策》、晁错《言兵事疏》等，使《汉书》具有了更丰富的原始史料，提高了利用价值。

另外，《汉书》的《西域传》远远突破《史记·大宛列传》的局限，正式论述了西域五十一国的历史与民俗。国别明，区域广，内容详尽，准确度高，学术价值更高，反映出汉代开拓边疆的战略眼光与开放兼容的胸襟。

在参据《史记后传》的过程中，他还利用了刘向、刘歆等人的补作成果。如《艺文志》取材于刘歆的《七略》，成为了解先秦秦汉典籍的基本依据。而《王莽传》内容丰富，对照《东观汉记》和诸家《后汉书》有意无意美化和抬高刘秀，贬斥与打压王莽的情况，此传更加客观详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尚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避讳。但他毕竟受史家直书传统的影响，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矛盾心理与作为，是阅读时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正如《后汉书·班昭

传》所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而此书深受朝廷推崇，流传既早且广，学者争相讽诵。为了解释疑难，从东汉起注者就较多。目前可知最早的《汉书》注是延笃的《汉书音义》。此外还有应劭和服虔的注。

但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注，一是唐颜师古注，一是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前者是颜师古对唐前二十三家注的总结，重在音义，不好考据。颜注自宋代起已分入纪传之中，一并流传。后者则是王先谦对明清以来六十七家注的综合，间有个人发明，是一部考证严谨，取材丰富的集大成之作。

阅读《汉书》当然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主，也可直接通读《汉书补注》本。

《汉书详节》三十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纂。是《十七史详节》中的一部。

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举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迁著作郎。期间曾奉诏重修《徽宗实录》，删订《圣宋文海》为《皇朝文鉴》，颇得孝宗器重。《宋史》本传称其“治学以关、洛为宗，旁稽载籍，心平气和，不立崖异，学士归心”。

吕祖谦与陈傅良同为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交往甚密。又与永嘉学派的翘楚陈亮、叶适为友，学风也十分贴近。双方都为南宋历史哲学的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

吕祖谦潜心史学，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明言“吕伯恭最为知古”，成为一时的公论。他在四十五岁时即英年早逝，存世著作有《古周易》、《书说》、《阆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等多部。于史学方面，曾作《大事记》十二卷，用编年之体，欲自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止于五代，惜撰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1)而止，未成完帙。他又著《东莱左氏博议》、《历代制度详说》等，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他的学风与朱熹接近，因此也颇得朱紫阳的赏识。

《十七史详节》多达二百七十三卷。虽如《四库提要》所言，“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却“足以为宋儒不废史学之明证也”。

“二十四史”是中华文化中与“十三经”并立的两大支柱之一，“前四史”则是历代称道的“二十四史”中的精品，是了解中国历史的起源和优秀史学传统，了解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以及其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和延续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强大学生国学基础培训的重要方式。吕祖谦的节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作为古代节本的代表，基本上能承担起这一责任，故而推荐。作为古代不多的正史节本，此书不仅可以作为《汉书》的选本来读，也可以从中了解宋儒的史学观，可谓一举两得。

整理说明

《汉书详节》三十卷，是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编纂的一部抄辑类史著，为《十七史详节》系列之一。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百卷的《汉书》，经过删节为三十卷，字数大大减少，而全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都得以保留，便于读者以第一手资料入手来了解汉代社会的历史，优越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看来，读《汉书详节》，至少还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有些心得甚至是直接阅读《汉书》未必能获取的。

首先，作为东汉班固编撰的一部史学名著，《汉书》在二十四史中，虽排列顺序第二，位于《史记》之后。不过，若就断代为史的正史体例来说，《汉书》则是第一部，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上自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下迄他本人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是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史记》虽然创立了纪传体史著，有关制度的志书体例其实并未完善。《汉书》中的《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内容包括了法律制度、物产资源及地理分布、先秦时期各派学术的源流，先秦至汉代时期对于天体天象等自然环境的认识，这些都是《史记》未曾有，而由《汉书》首创的内容。自《汉书》以后，这种断代为史以及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后世正史编纂的楷模，并沿承到近代。所以，《汉书》在正史中的地位，是其他史籍无法与之

相比的。

第二，《汉书》不但文字优美，且其中多见古字，即便就在东汉时期，《汉书》虽颇受朝廷重视，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容易读懂。因此，后世便出现了一些为《汉书》作注的学者，吕祖谦之前，成就最大的注家，当为唐初的颜师古。颜师古治学有渊源，参加过《隋书》的编修，还曾从事五经文字的考订，既通史学，又精于语言文字，是当时最理想的人选。《汉书》中的古字古训，加上历代注家的误释，和传抄过程中的误抄，经过颜师古的整理、注释，纷然厘清，功不可没。也因为这个缘故，《汉书》颜注的巨大成就，不但帮助后人消除了理解上的困难，还被人视作研究古汉语以及训诂学的重要语言材料。颜师古注文的相关内容，吕祖谦在摘抄《汉书详节》时基本上都保留了，这使得我们阅读时，又可获得许多有关古代汉语通假字、古今字的知识。

第三，清人在《四库提要》中，对《十七史详节》主要特点的介绍，归结为吕祖谦读史时“删节备检”之书，因而对读者有“撷取菁华，以便省览”之功，这只是就史抄类著作的一般特征而言。虽说是编删撮抄的工作，编选的过程中，选取何种有价值的文献，删除哪些属于次要的内容，孰重孰轻的标准，本身就包含了编者对于历史的理解。从对于各部分的删选情况来看，当然不会是等量齐观的。比如，经删节后的《食货志》，篇幅虽然很有限，却将文帝时晁错的《论贵粟疏》的主要部分都抄录下来，显然是因为晁错强调的重农思想，对于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如《项籍传》后，原书数百字的赞语部分，也几乎全文抄录，因为这是班固根据贾谊《过秦论》一文，对于秦何以国祚灭亡，以及楚汉之争中汉王何以最终获得天下等，作出的历史总结。此外，吕祖谦对《汉书详节》的体例，还做了一些补充，比如在人物传记或志书的最后，将见于本书其他地方的各种相关评价，甚或关键的词句，摘

录并附见于后，题作“互注”。这种互证的方式，既是一种归纳和强调，便于读者领会，亦同样可借以体会和把握吕祖谦的史学观点。

第四，《汉书详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便是作者在编纂时，选录了部分学者的评论，补充在相关史事或段落的后面，有太史公司马迁的评论，更多的是宋代学者的见解，如司马温公(司马光)、杨时(龟山)、胡寅(致堂胡氏)等多位学者的史评。不仅如此，对于原书的错误或者存在疑问的地方，还吸收了宋代学者司马光、刘攽等人的考订成果。如卷二《孝武帝纪》引司马光批评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斂，内侈宫室，外事夷狄，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几乎与秦始皇没有区别，却未蹈秦王朝的覆辙，关键在于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评价允当，亦能感觉到北宋士大夫议论的时代烙印。这些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虽然有限，却是吕祖谦精心摘选的部分，其中精彩的史评和精到的考订比比皆是。宋代史学发达，成果粲然，由此可得窥其一斑。这点也当是我们阅读过程中须加以关注并细细体会的地方。

南宋以来，《汉书详节》曾因广泛流传而多次刻印。这次整理工作，我们选作底本的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刘弘毅慎独斋刻本，以现存最早的元刻本为对校本。有关《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书的内容，还参校了通行的中华书局整理本等。凡节文衍、讹而当删、改者，加圆括弧，排小字；改正或增入的文字，加方括弧，以正文相同的字体置于讹字之后，或插入相应处，不出校记。限于个人学术水平，点校整理工作或错舛难免，乞读者不吝赐正。

戴扬本

2007年6月12日